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分歧*

陈信凌 王娟

【内容提要】近年来，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以价值中立的纯学术性外观屡屡被引入国内学术界，这是一个需要引起高度警觉的症候。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凿枘不合，其主要内涵是强调所谓的媒介独立、客观、均衡，以及行业自治。相较而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一个具备逻辑自洽性的观念系统，也是一个具备开放性、实效性的理论框架。而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则是一个包含逻辑悖论的观念体系，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而且还具有封闭性与空洞性的痼疾。我们通过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对照，剖解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质，对其进行理论祛魅，这不仅是专业研究范围内的一次学术操作，而且也是对一个具有迷惑性与挑战性的政治性议题的现实处置。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媒介

作者简介：陈信凌（1963-），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党报党刊研究会会长（江西南昌 330031）；王娟（1979-），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江西南昌 330031）。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既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完整的观念体系，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动态的理论工程。概而言之，它是指马克思主义对于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总体看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反映和体现。在其形成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筚路蓝缕，导夫先路。中国共产党不同时代的领导人继往开来，各有创获。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观念是西方新闻理论的核心部分，是西方关于媒体运行形态、体制、原则的实践惯例与价值取向。它既是一整套行业操作规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严谨地说，“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表述是不准确的，因为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现在我们所说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只是出现在以英美为代表的奉行自由主义媒介体制的国家里。

近年来，新闻专业主义成了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热词，不少学者都表现出了极大的阐释热情。可以肯定地说，其中的相关阐释所形成的某些关键性判断是失之偏颇不足征信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是以价值中立的学术性外观出现的，具有较大的迷惑性与劝服力，所以能够高调地活跃在我们各种学术与非学术的语境中。本文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通览并观，两相对照，意在更清晰直观地揭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内涵与基本取向。

* 本文系中共中央宣传部特别委托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研究”（14@ZH40）的阶段性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对立与差异

1. 体制上的对立与差异

(1)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崇尚所谓的媒介独立性与超越性。它强调新闻媒介的独立与自治是专业化的核心部分,强调新闻行业是一个独立系统,实行行业自律与自治,与政府和党派没有直接的利益勾连,也不受任何政治派别与利益集团左右,只是在专业规范下自主开展新闻实践。

美国学者赫伯特·阿特休尔对新闻自治的理念产生、成熟,及其在社会现行体制上的接纳,有过简洁而精当的勾勒。他认为:“自主的原则来自英国的思想,并在英国的哲学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只有在美国,这项原则才得到推崇。当年美国革命时期,这项原则被杰斐逊和麦迪逊鼓吹过。后来,它经过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和布兰代斯的补充加工日臻完善;到了今天,新闻从业人员与教学人员又合力把它推向鼎盛峰巅。”^①关于这里所提及的英国的思想,约翰·米尔顿关于出版自由的论述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在他1644年发表的《阿雷奥帕吉蒂卡》中,“观点的自由市场”之说已初露端倪。杰斐逊和麦迪逊是美国的第三与第四任总统,杰斐逊是“第四种权力”概念的最早倡导者。他视自由报刊为社会整体结构中的“第四种权力”,可以对行政、立法、司法起制衡作用。麦迪逊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起草人,美国新闻独立的法律依据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霍姆斯和布兰代斯在推动社会宽容地对待言论表达方面作出实质性的贡献,具体表现为在判例上提出了“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即使是在全国性的紧急状态下,言论自由也不应受到肆意的干涉,“只有在出现让时间来纠正恶果会造成即时的危险这种情况时”^②,才可以对宪法第一修正案采取例外的处置。

由此,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诞生的认知基础与现实环境已经形成,新闻媒体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就待有人直接点破与宣示。19世纪后半叶,美国大多数处于领先地位的报纸纷纷推行采编独立的方式。1896年,出版人阿道夫·奥克斯在收购《纽约时报》后提出了著名的思想与经济独立宣言。他任社长的第一天,就在报纸上刊发了自己的《商业通告》:“最诚挚的目标是不偏不倚地报道新闻,不畏强权,不徇人情,超越党派,利益无涉。”美国报纸编辑协会是美国报纸编辑部管理层最主要的行业组织,该协会的伦理规范把编辑独立放到首位,其中规定:“独立:除了忠于公众利益外,不得受任何义务约束,这一点至关重要。”^③

奥克斯的观点与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宣言之间共通之处是,强调新闻业务超越党派,不受政党控制。《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是美国一群学界与行业翘楚通力协作的成果,它把新闻独立性与自主性抬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国家不得侵犯的精神权利。”^④在这种意见情境中,言论自由与新闻独立就成了一种不言自明、毋庸置疑的公议与常识。

(2) 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相对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则注重媒介的阶级性与政治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传媒是一个具有显著阶级性与政治性的行业,媒介不仅不是自足自立的象牙塔,而且还是其所属政党或者机构整体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报刊的阶级属性,他们共同创办的《新莱茵报》就是无产阶级报刊的

① [美] 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黄煜、裘志康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3页。

② [美] 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展江、殷文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04页。

③ [美] 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刘海龙、连晓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0页。

④ [美] 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展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典范。迫于特殊情势，该报在出版时出现副标题“民主派机关报”，但是它“在各种具体场合强调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即站在“已经存在的、最先进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那一端去参加运动并推动运动前进”^①。马克思恩格斯还毫不避讳报刊与政治的密切关联。第一国际于1871年9月在伦敦召开了秘密代表会议，马克思恩格斯在会上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恩格斯明确指出：“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因为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都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②

在《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列宁清晰地提出：“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强调：“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正是在阐述“这个原则”的时候，列宁提出了报刊应该坚持党性原则，应该成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等重要观点。他的原话是：“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③

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认为：“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都有阶级性。”^④他还明确强调新闻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反对任何独立于党性原则的苗头。1942年10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批示中提出：“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⑤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要“政治家办报”，不要书生办报等主张。

习近平同志也一直注重新闻的政治属性和新闻舆论的党性原则，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还要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根据当今全新的舆论环境、媒体格局、传播方式，他还进一步指出：“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各级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要讲导向，都市类报刊、新媒体也要讲导向；新闻报道要讲导向，副刊、专题节目、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时政新闻要讲导向，娱乐类、社会类新闻也要讲导向；国内新闻报道要讲导向，国际新闻报道也要讲导向。”^⑥新闻舆论讲究政治导向不是随机性与选择性的，而是覆盖性、全时性的，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不可有丝毫的轻忽。

2. 技术层面上的差异

(1) 在技术层面，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追求所谓的客观性以标榜价值中立。它认为客观性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技术性标准，主张在采编上贯穿真实准确、公正平衡，意见与事实分开等理念。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认为，客观性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密不可分。詹姆士·凯瑞说，客观性和专业主义是长期扭结在一起的，甚至可能互为标识。舒登声则认为，客观性是新闻媒介作为一个专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9页。

③ 《列宁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3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3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4-455页。

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2-333页。

组织的意识形态^①。作为一种规范化的理想，客观性框定了新闻采写的技术要素，它强调报道忠于事实，或者忠于其他可靠的对现实的叙事。尤其是在具体的事实上，应该把观点与事实明确分开，报道中引用的材料出之有据；还主张叙述完整，提供理解新闻所需要的足够的相关信息，尽量给出与报道相关的事实真相。

具体来说，首先，客观性理念要求新闻报道要准确真实。一般认为，客观性的理念在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就已经在美国的报刊界确立。《纽约先驱报》的主编詹姆斯·戈登·贝内特就声称：将不带任何冗词和华丽辞藻记录下事实。他的话后来变成了一条新闻准则，并通过编辑室的等级制结构、精细分工得以严格地执行。这种对事实不遗余力的追求，可以不惜牺牲记者个人的写作个性与风格。正是在这种趋势之下，“一种更有规则、更少个性化的新闻写作方法，后来规范为‘倒金字塔’式结构，得到了广泛的欢迎”^②。其次，客观性还要求公正平衡，事实与意见分离。据国外一个研究小组的研究结论，客观性有多方面的含义：“对记者主观性的否定，对争论中每一方的公正陈述，对争辩中每一方均等的怀疑，寻找能为某一争论提供背景的确凿事实。每一种含义在记者中都有支持者。”^③说得更清楚一些，就是面对新闻相关当事方，记者只能奉行价值中立、不持立场的态度，只要描述事实，不能表达倾向。随着自由至上主义理论基础的确立，美国传媒行业形成了一套“客观报道理论”。在这套理论的影响下，“报纸记者认为，他们的工作需要一种超然的态度，他们要成为时下各种争论的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他们小心地避开任何党派色彩或评论行为。新闻是原始记录，必须与评论截然分开。在大多数美国报纸上，评论仅在社论版出现。客观报道理论业已成为美国新闻工作者引以为豪的一项职业理念，他们将报道‘当日事实’作为自己唯一的职责”^④。其实到了后来，即使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也很难辨清事实和价值判断之间有何明显区别，然而他们却仍旧要尊奉“客观性”理念，一如既往地态度上忠于“事实”，漠视“价值”。

(2)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技术上则注重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真实性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原则，强调对事实的报道不仅要出之有据，实有其事，而且要在整体上、本质上符合客观实际。同时它接纳新闻的倾向性，倡导新闻采编者应该有自己的情感倾向和立场态度。

大致来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关于新闻真实性的论述，是从两个层面上展开的。第一，新闻报道应该以事实为依据，戒绝任意编造。在马克思看来，新闻真实是报刊的本质，是人民群众拥戴与信任的前提。他在《〈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一文中写道：“报刊的本质总是真实的和纯洁的。”^⑤他认为，报刊应该进行真实的叙述，人民通过报刊了解自己的情况；报刊若失去了真实，也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人民就会认为报刊是某种无关紧要的、不值一看的东西。第二，新闻的真实性应该从总体上、本质上和发展趋势上进行衡量。列宁曾严肃地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

① 参见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② [美] 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展江、殷文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09页。

③ [加] 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沈荟、周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4页。

④ [美] 弗雷德里克·S. 西伯特、西奥多·彼得森、威尔伯·施拉姆：《传媒的四种理论》，戴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53页。

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① 列宁在此提出的应该超越具体的现实情境和个别现象，从整体的联系的视野下呈现新闻的真实性，体现出了唯物辩证的思维优势。

在强调新闻真实性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还旗帜鲜明地主张新闻媒体都应秉承自身清晰的立场和倾向，与价值中立的一套言说完全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英国的《北极星报》，认为它是“真正值得大陆上的民主主义者阅读的唯一英国报纸”，因为它同情全世界的民主主义者和工人，而且在所有这些问题上表达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意见^②。在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的报道中，从第一声枪响起，《新莱茵报》就坚定地站在起义者一边，迅速出版号外报道了这一鼓舞人心的消息。恩格斯为起义连续写了数篇消息和评论。报纸的编排顺序也根据斗争的需要做出了调整，把有关起义的消息都尽可能放在头版刊登。在《〈新莱茵报〉被勒令停刊》一文中，马克思更是明确了报刊的无产阶级性质，旗帜鲜明地指出：六月革命的灵魂就是《新莱茵报》的灵魂^③！

在十月革命以前的“农奴制专制俄国时代”，当时的报刊有的具有明确党派属性，有的没有党派属性。在列宁看来，那些表面上没有党派属性的报刊，其实“又都‘倾向’于这个或那个政党。畸形的联合、不正常的‘同居’和虚假的掩饰是不可避免的”^④。我们由此可以推断，新闻媒体的倾向性是一种必然的存在。

另外，所谓事实与意见分开，至多只是一种表象。只要深入到内里，就可以发现，它们二者是无法硬性割裂的。1946年，胡乔木在《人人要学会写新闻》一文中写道：“新闻却是一种无形的意见。从文字上看去，说话的人，只要客观地、忠实地、朴素地叙述他所见所闻的事实。但是因为每个叙述总是根据着一定的观点，接受事实的读者也就会接受叙述中的观点，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们从来不说我以为如何如何，我以为应该如何如何，他们是用他们的描写方法、排列方法，甚至特殊的（表面上却不一定是激烈的）章法、句法和字法来作战的。”^⑤ 显而易见，胡乔木对这个议题的回应简洁而有力。

3. 功能层面上的差异

(1)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强调传媒效忠的对象是公众，其实现方式是仅仅提供多样化的信息。为了标榜新闻的独立性、中立性与纯粹性，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论强调新闻应该超越政府、党派以及雇主，不必承受过多的现实责任，只需直接为公众服务，服务的方式仅仅表现为向社会提供可供选择的多样化的讯息。

对于传媒承担的社会责任，美国学者展开了系统的研究。他们的表述不尽一致，但其实质内涵却是惊人的一致。美国犹他州立大学丹尼·埃利奥特通过自己在研究界和新闻界的访谈调研，编撰了《负责的新闻界》一书，该书描述了关于新闻界责任的几种代表性意见。其中，约翰·C. 梅里尔认为，有三种大众传播的责任理论：由政府法定的责任、由大众媒介机构自身的专业标准界定的责任、由新闻业个人界定的多元化责任，美国大众传播界应该接受第三种责任理论，因为这种理论与美国传统价值观相吻合。其余两种则有可能使新闻界的自主性遭受限制和损伤。梅里尔甚至认为，民主社会需要依赖那些行动自由的新闻记者，当他们的行为看起来有些不负责任时，社会应该容忍。拉尔夫·D. 巴尼表达了相近的看法，他认为美国是一个“参与性社会”，这种特质的社会建立在鼓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64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8-29页。

③ 参见邵华泽主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运用与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页。

④ 《列宁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2页。

⑤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96页。

励和尊重个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基础上。大众媒介有责任提供多样化的信息，为个人或特定利益集团服务，为他们在做决定或发表意见时，提供选择和确定的机会。因此，只要大众媒介尽可能多地向公众提供可以选择的讯息，就是履行了自身的社会责任。

传媒是一个行动力与干预力很强的行业，为其设定社会责任完全可以从不同方面向不同层级展开，而上面的两位学者实质上只是概括性地认可了向社会提供多样化讯息的责任。很显然，他们有一种极力消解与淡化媒介社会责任的内在驱动，可是这个意见体现出的是美国学术界的主流取向。《传媒的四种理论》写道：“按照自由至上主义观点，大众传媒的功能是告知信息和提供娱乐。第三项功能的出现与前两项密切相关，即为传媒提供经济基础，保证传媒在经济上的独立。这就是销售和广告功能。从本质上看，传媒的根本目标是通过提供各种事实和观点作为判断的基础，来帮助公众揭露真相，协助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①

(2)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主张传媒的服务对象是人民，其实现方式是宣传与推动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大局与中心工作。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框架里，新闻媒体是一个可供政党、政府和人民使用的特殊工具。具体说来，就是能够借以动员社会，组织群众，凝聚力量，以达到实现政党愿景、践履政府承诺、增进人民福祉的目的。

马克思曾用“耳目喉舌”指称报纸的基本定位。1849年2月，他在驳斥反动势力对《新莱茵报》的控告时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② 1851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创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他们在出版启事中指出：“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丰富多彩的每日事件，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③ 对于新闻媒体的现实功能，列宁则有更为清晰与具体的论断。他认为，包括新闻媒体在内的党的出版物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无论是耳目喉舌还是齿轮螺丝钉的比喻，都说明新闻媒体只是其所归属的机构的一个工具，其工作取向与行动轨迹应该服从与服务于主体的意旨。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逻辑体系里，新闻媒体是其所归属的阶级与政党整体事业的一个部分，作为一种特殊的工具，它的责任就是要为其所归属的阶级和政党服务。很显然，其服务的具体表现就是宣传其所归属的阶级与政党的性质与愿景，配合其不同时代的事业大局与中心任务。列宁在《从何着手》一文中写道：“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④ 在这里，列宁希望报纸发挥自身的优势，配合党和政府的事业大局与中心任务富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的事业大局与中心任务具体的内涵各有不同，那么，新闻媒体的报道重心应该随之调整并迅速跟进。列宁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中强调：“政治已经完全‘明朗化了’，它已归结为两个营垒的斗争……关于这种政治，我再说一遍，可以而且应当谈得十分简短。多谈些经济。”^⑤ 该文刊登于1918年9月20日的《真理报》上，此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

① [美] 弗雷德里克·S. 西伯特、西奥多·彼得森、威尔伯·施拉姆：《传媒的四种理论》，戴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2-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7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5页。

④ 《列宁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页。

⑤ 《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1页。

一年，列宁这里倡导报刊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并不是要淡化报刊的政治色彩，而是要求报刊的报道重心积极跟进党和政府的工作大局，实际上是当时历史情境下的最大的政治。

毛泽东对新闻媒体的责任也有深刻的认识，极为重视报刊在政策宣导、协调群众、服务大局、推动工作方面的作用。他认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①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新闻宣传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②。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根据全国即将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新形势，明确提出：“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③今天，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情境中，习近平同志对新闻的职责进行了新的提炼与阐述，他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④这既精粹又全面的48个字，现在已经成了我们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遵循。

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特性分歧

基于以上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核心内涵的对比，再参酌二者的其他相关禀赋，可以从更深层次建构起对它们整体特性的认知。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就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而言，这种整体认知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其本质属性与核心取向的把握。

首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一个具备逻辑自治性的观念系统。逻辑自治性通常是指“建构一个科学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之间、基本假设和由这些基本假设逻辑地导出的结论之间以及各个结论之间的相容性、非矛盾性”^⑤。简单地说，一个具有逻辑自治性的理论架构起码应具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理论在整体上应该是平顺畅达的；第二，理论的各个部分之间应该是相融相生、相辅相成的。更进一步说，一种理论体系是否具有逻辑自治性，重点还要看该理论体系能否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不断实现自我建构和自我完善。“从静态意义上看，自治性意味着理论在实现自身的过程中把握了实践的需要，与实践相互作用、相互改造的特殊状态，回答了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性 with 价值引导性的动力源泉；从动态意义上看，它反映了理论体系同化其他理论信息和实现自我超越的基本过程，即在外环境与价值理念作用下，科学地吸收新因素、不断克服不合理因素进而不断发展和超越自身的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过程。”^⑥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正是一个逻辑自治的有机系统，其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等各个部分之间相互依存，自然贯通。而且它还具备不断发展机制，随着媒体格局、舆论生态以及传播技术的演化，能够依托自我发展机制实现自我完善、与时俱进。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则是一个包含逻辑悖论的观念体系，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在英美等国，“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和“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一直是两个被激烈争辩的概念，其核心含义一直处于不断的解释中，界限更是模糊不清。在讨论中，大家比较认可的专业化理想的类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18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8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2页。

⑤ 陈殿林：《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自治性》，《长江论坛》2007年第3期。

⑥ 张国启：《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逻辑自治性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1期。

型是基于历史上典型的“自由”职业，首先是医务与法律。与提供私人服务的医生与律师不同，新闻从业者是在一个批量性规模化生产为规范的产业中生产，他们基本不拥有自己的制作手段，只是大型企业的领薪雇员。很显然，专业自治永远是专业化这一理念框架的核心元素。一般认为，行业的自治之所以成立，不是因为政府或者其他外界力量的制度性赋权或者施惠，而是由于有专业技术与知识的壁垒，局外人无法干预与介入。正是从这个层面上，美国学者解释了新闻业与自治无缘的现实：“新闻事业从未取得过某种程度上的自治，医生或律师的自治首先是基于医术和法律的‘深奥的’知识，而新闻工作者缺乏深奥的知识。”^①此外，新闻专业主义所追求的客观性也是充满着纠结与困窘。客观性意在彰显媒体超越党派、价值中立，这其实只有姿态或者形式上的意义，因为向中间靠拢的取向仍然是一种政治倾向。还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形式上的意义也是极其有限的。许多美国报纸在新闻版中较多采用“以事实为中心的话语”，但是在社论版上却一直保持连贯性的政治取向。社论版与新闻版的分离与错乱症候，是新闻专业主义逻辑悖论的典型表征。

其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一个开放性的理论系统。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看来，新闻传媒是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不分畛域不设门限，实际上是与整体社会的其他子系统连缀拼合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过去习惯上把这个场域的从业人员称为社会工作者。此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动态思想系统，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演进状态之中，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环境下会有不同的创新性成果出现。而在具体运作上，则一直倡导并延续外向性的基本取向，诸如开门办报、群众办报、全党办报就是这种取向的具体体现。列宁在创办《前进报》《无产者报》《真理报》期间，就鼓动广大工人群众积极投稿，“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②。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就开始探索并充分实施了开放办报的理念。后来，毛泽东对这种办报取向有一个概括性的表述：“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③

与此正相反，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是一个封闭性的观念体系。它不仅认为新闻传媒是一个壁垒森严的独立系统，而且还是自律自治的领域，英美学者正是由此彰显媒介是一个别有洞天自成体系的行业。自律一般通过全行业的组织或者单一媒体内部特设机构的评价机制体现，自治主要表现于对媒体业主与从业人员的约束。总之，这一切都在行业内部解决。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媒体的实际运作越来越疏远人群、脱离社会。两位美国学者对此有清醒的剖析：“就像众多职业观念一样，在某些地方，编辑独立逐渐僵化而变成编辑孤立。新闻工作者从政治和商业压力那里赢得了来之不易的独立，但是在敬重和保卫独立性的过程中，有时他们走向了为了独立而独立的极端。为了和外部势力保持距离，结果却有可能脱离群众。”^④在这里，由美国学者说出“走向了为了独立而独立的极端”一语，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它充分地暴露了所谓专业自治的实质。

最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一个实效性的理论。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它认为社会生活的本质就是实践，所有的观念都应该围绕实践展开阐述，改造世界比解释世界更值得推许。作为一个不断演进与发展的动态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自然也秉承着现实导向与实践品格。具体而言，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们在与新闻工作相关的

① [美] 丹尼尔·C. 哈林、〔意〕 保罗·曼奇尼：《比较媒介体制》，陈娟、展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5页。

② 《列宁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19页。

④ [美] 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刘海龙、连晓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1页。

阐述中，都是非常关注动感的社会、火热的现实，所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面临着不同的历史境遇与现实课题，但是都无有例外地聚焦时代主题、中心工作、民生关切，以推动社会进步与增进人民福祉。正是由于具备这种现实导向与实践品格，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具有无限的韧性与张力，始终呈现出活力四射的气象。

比较而言，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则是一套空洞性的观念体系。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无法涵盖西方新闻实践的实情。有欧洲的研究者通过调查后发现，受访的英国、瑞典、德国和意大利的新闻从业者可以根据一个广泛的政治光谱给全国性报纸定位，而他们的美国同行则将各大新闻组织定位在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小范围内。第二，它没有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实际助益。前文已经提到，新闻专业主义认为新闻事业的责任就是给社会提供多样化的信息，此外没有更具体的承担。詹姆斯·麦迪逊提出新闻业的主要责任就是为了维护新闻的独立性，守护自由就意味着承担责任。此后美国的学者在这个议题上的思考，基本上就以此为限了。基于新闻界出现的许多问题，不少学者热情地讨论媒介的责任，而且也考虑责任有来自外界对媒体的“责求”的含义，但这隐含着谁能或者谁有权要求媒介承担责任的意味，故而便担心引出限制新闻独立与自由的后果，于是就裹足不前了。赫伯特·阿特休尔给出了一个例证：“在美国，人们对于把新闻媒介称为教育的提供者感到某种不安，人们习惯认为新闻媒介是信息的提供者。”^① 第三，服务公众很大程度上是空洞性的。它在形式上强调为公众服务，其实，这种服务是概念性与抽象性的，它源自其公共服务的理念：“我们提出了将新闻事业视为一种公共信托、一种观念的见解，来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定义性特征之一，那就是新闻事业在某种意义上服务于超越特定社会利益的公共利益。”^② 那么从根本上可以说，它对新闻实务阐释疲弱，对社会承担乏力，在较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理想性的规范、象征性的符号。

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超越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观念整体特性的剖解，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现了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全面超越。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显示出的逻辑悖论、视野偏狭、观念空洞，是其与生俱来并且永难根除的顽疾，而这些特性直接导致其理论与现实严重脱节，在较大程度上成为自说自话的独白或呓语，不少西方学者对此也深信不疑。曼西尼曾经对这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分裂展开了分析，指出分裂主要体现在两点：“其中一点和在任何准则中都很少提及的记者的调查性、批判性和倡导性角色有关；另一点则与假定的新闻中立性和独立性相关。实际上，大多数新闻界在运作时，都会和政府、政党、有势力的经济利益以及其他权威有密切的共生关系。这些观察至少得出一种结论：新闻准则作为一种理论是不充分、不完整的。它们更应该被认为是带有特定目的的特定意识形态。”^③ 曼西尼依据其理论与现实脱节的症状，直接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视为“不充分、不完整的”观念体系。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则以其逻辑自洽、思维开放，充分展现出了理论的科学性、先进性、实践性品格，这是其具备丰沛的生气、蓬勃的活力根源之所在。而且更需强调的是，这套理论蕴含着自我完善机制，这实际上表明它对自己此刻所达到境界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知，因而不会选择一劳永逸、

① [美] 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黄煜、裘志康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316页。

② [美] 丹尼尔·C. 哈林、〔意〕保罗·曼奇尼：《比较媒介制度》，陈娟、展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2页。

③ [荷] 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崔保国、李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2页。

裹足不前。恰恰相反，依照其自身的逻辑框架，它一定会在与时俱进中始终永葆不竭的阐释力与引导力。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立者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一些观念，实际上曾经有过直接与正面的回应与交锋。马克思在1861年指出，被誉为英国舆论“客观”“公正”代表的《泰晤士报》，当时其实不过是帕麦斯顿政府的“奴隶”。帕麦斯顿设法把《泰晤士报》的某些有影响的人物拉到内阁中担任次要的职位，并把其他人接纳到自己的社交圈子予以安慰；作为交易的另一方，《泰晤士报》在不列颠的对外政策上大肆为帕麦斯顿政府造势。对于新闻自由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观念框架的核心假设与基本前提，恩格斯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出版自由就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出版需要钱，需要购买出版物的人，而购买出版物的人也得有有钱。”^①列宁继承了关于自由的这个判断，并进而指出这样的所谓自由其实是一种“伪善”。他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先生们，我们应当告诉你们，你们那些关于绝对自由的言论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②很显然，这些意见在今天仍具有极大的警世价值。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倡导新闻的阶级性与政治性，展现出了其开放性与实效性；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标榜独立性与客观性，暴露了其封闭性与虚伪性的实质。因而，二者存在着结构性的区隔，不具任何的相容性与相通性。此外，我们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基于长期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经验的主动选择，它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情境与发展愿景合若符契；而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则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的产物，它寄生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社会制度框架，本质上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二者原本应该是各行其道的。但是，一些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论者常常以国际范围内新闻传播的当然叙事者与阐释者自居，给他们的新闻理念植入一种不言自明的普适性与通约性禀赋。而国内一些学者显然落入了这种学术圈套，他们似乎觉得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稀缺的理论资源，高声调、大范围地竭力推介。其实，诸如此类的种种，都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大气象大格局大氛围格格不入的。因而，我们现在剖解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质，对其进行理论祛魅，不仅是研究范围内的一次学术操作，而且也是对一个具有迷惑性与挑战性的政治议题的现实处置。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
- [2]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
- [3] 陈力丹编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新闻》，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年。
- [4] 童兵：《厘清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认知》，《新闻与写作》2015年第9期。
- [5] 郑保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理论贡献》，《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2期。
- [6] 黄瑚、徐蓓蓓：《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性贡献》，《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10期。
- [7] 虞鑫、陈昌凤：《政治性与自主性：作为专业权力的新闻专业主义》，《新闻大学》2018年第3期。

（编辑：黄华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48页。

② 《列宁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6页。